

（二〇一六年一月五日出版）

本期目录

【大事辑要】	毛泽东、林彪与罗瑞卿关系大事辑要（增订版）	余汝信
【春秋史笔】	张春桥为什么摧折周信芳	金大陆
【自由论坛】	文革五十年祭——互害模式下的中国	蒋祖权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大事辑要】

毛泽东、林彪与罗瑞卿关系大事辑要（增订版）
（1965年1月—1966年6月）

• 余汝信 •

1965年

[65001] 毛泽东不点名批评刘少奇

1964年12月，关于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有关问题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与刘少奇发生了当面的意见冲突。1965年1月3日晚及5日下午，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连续地不点名批评了刘少奇在指导“四清”运动中的一些做法。1月13日下午，刘少奇召集党内生活会，以对自己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贺龙、陈毅、陈伯达、李井泉、罗瑞卿等共十七人。

[65002] 林彪不点名批评罗瑞卿

1964年12月29日晚11时，林彪在广州接见了总政副主任刘志坚和《解放军报》副总编辑唐平铸。据1966年1月军委重新印发的《林彪同志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称，此前，林彪看了刘志坚和叶群（林办主任、林彪夫人）在一二七师三七九团红一连蹲点写的几份报告，并听取了叶群的汇报。林彪当晚称：“一九六四年全军各方面的工作成绩是很大的，部队的政治情绪高，作风好，干劲大，毛主席思想红旗举得高。总的说来，成绩是主要的。但是，现在出现了不好的苗头，军事训练搞得太突出，时间占的太多，军政工作比例有些失调，冲击了政治。有的部队只抓军事技术，不抓政治思想，甚至弄虚作假，搞锦标主义和形式主义。这样下去，必然会把政治工作冲垮，把其他一切东西冲垮，也会把军事训练本身冲垮。要敲警钟，如果听其自流，不加纠正，那就不得了。明年的工作要突出政治，大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大抓毛主席著作的学习，在全军掀起一个更大、更广泛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把毛主席著作当作最根本的必修课。要赶快采取措施，使军政工作比例正常化，恢复一九六二、六三年的正常训练情况，纠正最近一个时期出现的失调现象。”

林彪的指示，实际上是对罗瑞卿不点名的批评。

1965年1月4日，军委以〔65〕1号文件转发《林彪同志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至军以上党委。1月13日，林彪将其指示报送毛泽东，同日军委办公厅发出《转发〈林彪同志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重新印发的通知》，收回军委〔65〕1号文件。1月15日，军委以〔65〕4号文件转发毛泽东当日对《林彪同志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的批示及林彪1月13日给毛的信。毛的批示为：“林彪同志：此件早已看过，完全同意，照此执行。执行中逐步总结经验，大约一年总结〔结〕一次，至多两次也就够了。这是就军说的。中、下级单位，则要一年总结多次。”1月18日，刘少奇对林彪指示作出批示称：“此件前次已经看过。完全赞成。退军委总参。”

以上，均可视为毛泽东及刘少奇对林彪的支持。

2月9日，军委以内部文件形式（注明：发至连，向战士认真传达，组织讨论），重新印发经修改后的《林彪同志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军委文件还公布了毛泽东1月15日及刘少奇1月18日的批示，并公布了军委1月12日的通知称：“林彪同志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是一个很适时、很重要、抓住关键问题的指示。正如林彪同志指示中所说的，一九六四年全军各项工作都获得了很大成绩，成绩是主要的，是一片大好形势。但是，有些部队也出现了一些不好的苗头，林彪同志及时地敲起警钟，不使那些偏向得以发展，这是很重要的，应当引起全军的严重注意。全军一九六五年的各项工作，都应根据林彪同志的这个重要指示来进行安排，务必使之落到实处。”

〔65003〕林彪再度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

1月4日，根据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决定，国家主席刘少奇任命林彪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与六年前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有所不同的是，林彪取代了陈云，在副总理中排名第一。陈云退居为次，邓小平则名列第三。

〔65004〕突出林彪形象

1月31日，适逢遵义会议三十周年，邮电部今日特发行一套共三枚纪念邮票，图案分别为毛泽东像和《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决战前夕》两幅油画。其中《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为彭彬根据毛词《忆秦娥（娄山关）》创作。画面突出了（实为虚构）毛与林彪长征途中在遵义娄山关上的形象。1月出版的《人民画报》1965年第一期，亦以两版的显著篇幅刊载了该画。将毛林并肩战斗的艺术形象首次公开呈现在全国公众面前，并与毛对刘少奇的不满同时出现，似非巧合。它准确地预言了一年多以后“刘下林上”的政治变局。

〔65005〕毛称赞“四个第一”是个创造

2月22日下午，毛泽东和周恩来、邓小平、彭真、李富春等接见出席海军干部工作会议、《解放军报》编辑记者会议的人员和第三批战士演出队时，毛称：四个第一好。我们以前也未想到什么四个第一，这是个创造。谁说我们中国人没有发明创造？四个第一就是创造，这是个发明。我们以前是靠解放军的，以后仍然要靠解放军。

“四个第一”，为林彪在1960年首次提出的在军队政治工作领域中要正确处理的四个关系：人和武器相比较，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和其他各种工作相比较，政治工作第一；政治工作中事务性工作和思想工作相比较，思想工作第一；思想工作中书本思想和活的思想相比较，活的思想第一。

[65006] 林彪批评为罗瑞卿传话的刘亚楼

据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转发、经毛泽东审阅的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1965年2月14日、15日，刘亚楼（余注：正在上海治病的空军党委书记、司令员）在罗瑞卿的指使下，向叶群讲四条意见，希望她劝林彪接受。这四条意见是：第一，一个人早晚要出政治舞台，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不出也要出，林总将来也要出政治舞台的；第二，要好好保护林总身体，这一点就靠你们了；第三，今后林总再不要多管军队的事情了，由他们去管好了，军队什么都有了，主要是落实问题，不要再去管了；第四，一切交给罗去管，对他多尊重，要放手让他去管。刘亚楼还对叶群讲，“罗总长说只要你办好了这件事，罗总长是决不会亏待你的。”刘亚楼提出后，叶群说，“这样大的问题，你和我讲是不合适的，你要说，请你直接和林彪同志说好了。”

据《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2月19日，刘亚楼到林彪处，向林彪讲了2月14日、15日向叶群讲的第四条意见的大意，说要多尊重罗，更相信罗，军队的事情放手让罗去管。林彪当时严肃地批评了刘亚楼，并向刘亚楼指出了1961年以来罗的思想情况、恶劣倾向及近年来对罗进行批评的经过，刘亚楼表示他过去受了罗瑞卿的骗，上了罗瑞卿的当。

5月7日，刘亚楼病逝。林彪任刘亚楼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刘亚楼病重时，周恩来、林彪等曾前往探望。5月8日，刘亚楼的骨灰在空军政委吴法宪等护送下从上海专机运来北京，林彪、彭真、贺龙、聂荣臻等前往机场迎接。5月11日，首都各界两千五百多人举行公祭大会，追悼刘亚楼。公祭大会由林彪主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陪祭，罗瑞卿致悼词。

刘亚楼病逝后，吴法宪代理空军党委书记，改任空军司令员，余立金任空军政委。

对刘亚楼评价内外有别。萧华1966年3月称：“我们对刘亚楼同志的看法是一分为二的”，“刘亚楼同志是个极端个人主义者，也有个人野心，当了罗瑞卿同志的工具”。

[65007] 林彪等批评罗瑞卿

据《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罗瑞卿2月23日上午去见在上海的林彪，向林彪表示，今后他更相信林彪的领导，更拥护林彪的领导，说今后是“跟定了”。林彪指出，“要跟党中央、毛主席。”并要他今后改正过去的一些想法，好好工作。林彪因罗对刘亚楼谈了许多不应该谈的话，批评了他。

4月12日至5月31日，军委在北京召开全军作战会议。会议学习了毛泽东关于战略问题的指示，讨论了总参作战部修改的全军作战计划和战备计划草案。5月19日，林彪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中央常委接见军委作战会议全体与会人员，在听取汇报时作了指示。据《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罗瑞卿事先没有请示报告军委常委，就布置各小组选出代表和他一块向中央常委提意见。他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带头提出要求大量增加部队定额和合并军区的意见。他发言后，就要求各军区的同志发言，妄图造成一

种声势，逼着中央常委马上表态。罗这一恶劣做法，当即受到林彪和其他中央常委的严厉批评。罗合并军区和大量增加部队定额的主张，林彪多年来是一直不赞成的，并且向毛泽东请示报告过，毛完全同意林的意见。5月25日，林彪看到军委作战会议简报第63期后立即指示：“作战会议只能以主席、中央常委和会议多数人的意见和会议文件作为结论，不准任何个人以总结的名义讲话。元帅、总长和副总长都可以发言，会议上不能散布个人做结论的空气。如果散布了，要当众宣布收回。在什么范围散布的，就在什么范围收回。63号简报，关于罗总长做总结发言的提法不对，要具体进行的问题，以后可以逐步用军委常委或军委办公会议的名义发出指示。”林彪的秘书立即将此指示用电话通知罗瑞卿的秘书。

1965年4—5月间，应是林、罗关系最紧张的阶段。除军委作战会议问题上林对罗的批评外，《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又称，“一九六五年四月，林彪同志又明确指示，今后军队六级（中将）以上干部和总部各部部长的任免，要先请示报告军委常委各同志，然后再上报党中央审批。罗瑞卿同志对这一指示却置若罔闻，一九六五年五月，全军中将以以上干部的定级，他不请示报告林彪同志和军委常委，即擅自决定用军委的名义上报党中央。罗瑞卿同志还经常以林彪同志和军委常委各位同志身体不好为借口，不准别人去请示工作和汇报情况，谁去请示工作或汇报情况，他就训斥、打击。”

[65008] 杨成武的提升和扩权

4月23日，林彪致函贺龙、聂荣臻、罗瑞卿并报军委、中央称：“4月22日，我见到了毛主席，谈到了两个问题，都得到了主席的同意和指示”。林称，第一个问题涉及为了备战而学游泳和修工事。第二个问题是：“由于战争威胁的加重，主持军委经常工作的力量应当加强。军委原来有三个副秘书长，其中萧华同志患病短期不能痊愈，决定增加杨成武同志为军委副秘书长之一，同时担任总参谋部第一副总参谋长。这样就能使瑞卿同志有时不在时、病时和太忙时，能代理主持办公会议。且由于担任副秘书长的的工作，还可以加强直接向中央报告、请示；联系军政两方面的工作；和与各军兵种、各大军区直接联系，以加强上、中、下的通气和商量问题的便利。”6月10日，以林彪奉国务院总理周恩来6月7日命令形式，任命杨成武为第一副总参谋长，6月14日，中共中央批复中央军委，同意增加杨成武为军委副秘书长。

对杨成武职务的提升和扩权，都是针对罗瑞卿的。

[65009] 萧向荣免职

11月15日，被视为罗瑞卿亲信的萧向荣，被宣布犯有“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突出政治、和林副主席‘唱对台戏’的严重错误”，责令停职检查，并受到内部批判。18日，被免去一切职务。此前11月10日，中共中央免去杨尚昆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遗缺由毛的亲信、中办警卫局局长汪东兴接替。萧的免职比杨尚昆免职仅迟了数天。

萧向荣此前任军委副秘书长、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军委办公厅（兼国防部办公厅）主任。萧免职后，杨成武任军委办公厅代主任，路扬任第一副主任，增加金涛、郑汉浩为副主任。并明确军委办公厅又是国防部办公厅，又是总参谋部办公厅。

萧华1966年3月称，“还有萧向荣同志，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在罗瑞卿同志的包庇纵恿下，帮助罗瑞卿同志干了很多坏事。”

[65010] 召开上海会议以解决罗瑞卿问题

11月28日，林彪在苏州听取了罗瑞卿在两广看地形及沿途部队情况、北京批判萧向荣与11月11日空八师飞行员李显斌驾机叛逃等情况的汇报。林彪说：“就是要突出政治。突出政治就是突出革命。突出革命，他就不去反革命了。”

11月30日，林彪致函在杭州的毛泽东：“主席：有重要情况需要向你报告，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早就提议我向你报告。我因为怕有碍主席健康而未报告，现联系才知道杨尚昆的情况（叶剑英讲的）觉得必需向你报告。为了使主席有时间先看材料起见，现先派叶群送呈材料并向主席作初步的口头汇报。如主席找我面谈，我可随时到来。”12月1日，叶群携带林彪给毛的信和有关罗瑞卿的材料秘密赶到杭州，向毛作了长时间的汇报。

叶群在12月上海会议发言时称，“罗个人主义已到野心家，除非把国防部长让他，他当了国防部长又会要求更高的地位，这是无底洞。林今年问主席在哪里，罗明知他不告；罗见林是突如其来，但总理交代他报告的事都未报告。后来林觉得不向主席报告不行了，要我把材料和情况向主席报告一下，请主席考虑。主席很耐心的听了我七个多钟头的汇报，并要我马上离开，以保安全。”

12月2日，毛泽东在林彪报送的中共兰州军区委员会关于陆军第五十五师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的情况报告上批示：“林彪同志：完全同意你的看法，五十五师的情况，可能和各师、各军种、各兵种大同小异。请你考虑，可否将此件转发到各军区、各军种、各兵种、各军，到师党委为止，供他们参考。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如何，请酌定。”

五十五师的报告及林彪的附言，均没有只言片语涉及罗瑞卿。毛是借题发挥，虽然他的批语通篇也没有点罗的点，但知情者一看就明白矛头所向。

12月3日，林彪致信毛泽东称：“主席：十二月二日主席有关五十五师突出政治一文的批示已经收到，主席的批示对于即将召开的政工会议与明年和今后的政治工作将是一个强大的推动。军队如不加强政治工作，不但打仗经不起考验，而且投敌事件还会更多的发生。其他如破坏军民关系等坏事还会增加。我完全同意主席的批示，决遵照主席指示送北京少奇、恩来、彭真同志阅和军委常委阅，然后发师以上党委。祝主席健康并致敬礼。”

林彪的信，亦无一字涉及罗瑞卿。然而，一个针对罗瑞卿的计划，已在极其隐秘中悄然展开。

12月5日，毛泽东从杭州抵达上海。

12月7日，毛泽东几次批示身边工作人员，通知一些负责人来上海：“请用电话，告叶剑英、萧华、杨成武（在杭州）、谢富治四位同志，于本日下午到上海一谈。”“宋任穷、陈锡联（东北）、李雪峰、杨勇、廖汉生（北京）、杨得志一架飞机共七人（余注：按毛列的名字应为六人），于八日上午来此。”“贺龙、董必武、王尚荣、李天佑、张爱萍、雷英夫、徐向前、刘伯承（如卧病，可不来）、朱德，共八人，于十二月八日上午来此。”“许世友、韩先楚、陈毅、陶铸、王任重、李井泉、刘澜涛七人于十二月八日来上海。”“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三同志：请于本日或明日到上海一谈。在四川，由成都转告。”

12月8—15日，毛泽东在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后简称党中央上海会议），“揭发和批判了罗瑞卿同志的错误，和他进行了背靠背的斗争”。

参加会议共61人。其中政治局常委6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陈云未到会）；政治局委员7人：董必武、陈毅、李富春、贺龙、李先念、李井泉、谭震林（彭真在京“看家”未到会，刘伯承请假）；政治局候补委员5人：乌兰夫、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薄一波；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6人：谢富治、徐子荣、吴冷西、汪东兴、李质忠、刘宁一；各中央局负责人6人：陶铸、刘澜涛、宋任穷、王任重、陈丕显、李雪峰；军委、总部、军种和大军区负责人28人：徐向前、叶剑英、萧华、杨得志、张爱萍、吴法宪、李作鹏、苏振华、王新亭、张国华、秦基伟、刘志坚、邱会作、韩先楚、黄永胜、李天佑、杨勇、梁必业、张达志、黄新廷、杨成武、陈锡联、萧劲光、许世友、廖汉生、陈再道、张宗逊、郭鹏（聂荣臻请假，萧向荣未到会）；另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副部长雷英夫，林办主任叶群3人。

到会人员除毛泽东、刘少奇、林彪3人不编组外，其余编为三组，第一组召集人邓小平、陈毅，第二组召集人谢富治、李井泉，第三组召集人周恩来、贺龙。

上海会议，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这样高规格的会议，只有毛泽东动用其中央主席的权力才有可能召集。毛尤喜欢使用类似“扩大会议”的形式，随心所欲地将到会人等扩大至他本人认为合适的范围。上海会议到会总人数61人（原定63人，刘伯承、聂荣臻2人请假未到会），已经是常委人数的八至九倍。以党内最高层加上其他重量级人马共61人去对付罗瑞卿一人，充分说明了毛对罗问题的极其重视程度。

会议印发了十一份材料，即：1、1965年11月30日林彪给毛泽东的信；2、1965年4月15日刘亚楼给罗瑞卿的信；3、1965年5月20日林办工作人员的揭发材料；4、1965年6月张秀川《罗总长对突出政治的错误看法》；5、1965年10月15日张秀川给林彪的信；6、1965年10月25日雷英夫给林彪的信；7、1965年10月25日雷英夫《我对罗总长的几点具体意见》；8、1965年11月27日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给林彪的信；9、张秀川《罗总长对主席思想的错误观点》；10、雷英夫《罗总长对待主席指示的几个问题》；11、1965年12月6日雷英夫电话报告纪要。叶群在分组会议上分别介绍了有关情况。

上海会议确定了处理罗瑞卿问题的五条意见：“一、性质严重，手段恶劣。二、与彭、黄有别。三、从长期看，工作有一定的成绩。四、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五、领导有责。”“处理两步走，调动职务、不搞面对面，冷处理。”

12月23日，毛泽东与彭真单独谈话时提到调查罗瑞卿问题，要彭真回北京后找公安部和中央军委同志谈，注意“地下活动”，并说：在党内军内永远不准搞地下活动。

上海锦江饭店会议结束，随即停止了罗瑞卿在军事系统的所有职务。罗瑞卿的实权性职务一分为二。军委部分，由叶剑英承接；总参部分，由杨成武承接。12月29日，杨成武任代总参谋长。叶剑英、杨成武加上萧华，为1966年间实际负责处理军委日常事务工作的三驾马车。

1966年

[6 6 0 0 1] 毛泽东在南昌谈罗瑞卿问题

1月5日，毛泽东在南昌与江西党政负责人杨尚奎、方志纯、刘俊秀、白栋材、黄知真等谈话，汪东兴参加。谈到罗瑞卿问题时，毛泽东说：这个人就是盛气凌人，锋芒毕露。党也是一分为二的。十个指头，分一个小指头出去，也是一分为二；分一个大指头出去，也是一分为二。一分为二，不要怕，党还是要发展的。就是领袖坏了，也不要怕。七大的时候，有些人就“左”得很，坚决反对王明他们人选新的中央委员会。其实，选上他们，无非一个是改，一个是不改。不改也没有什么坏处。我也同罗瑞卿谈过，要他到哪个省去搞个省长，他不干。军队工作他是不能做了，要调动一下，可以到地方上去做些工作。

[6 6 0 0 2] 中共中央决定增加军委副主席

1月8日，中共中央决定增加陈毅、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为中央军委副主席。

至此，中央军委组成：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贺龙、聂荣臻、陈毅、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常委（主席、副主席均为常委，从略）朱德、邓小平，委员（常委均为委员，从略）粟裕、萧劲光、王树声、许光达、萧华、苏振华，秘书长缺，副秘书长苏振华、萧华、杨成武（1966年3月后增加王新亭）。处理军委日常工作的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杨成武、萧华、邱会作、张爱萍。

[6 6 0 0 3] 第51次军委常委会议谈罗瑞卿问题

2月1—4日，第51次军委常委会议在广州召开。与会者对罗瑞卿问题分别发表了看法和意见。

叶剑英称：“我们在战略上藐视，他是纸老虎。在战术上要当作真老虎打，这个家伙是很厉害的。我们作自我批评，作了自我批评，并不是和罗一样，是认识问题，要划一条线。”

贺龙称：“这个人很坏，什么坏事都可以干得出来。他在公安部搞了什么？要防止暗杀。主席指示很重要，看得高，看得远，看得深。主席的话是灵的，对他要大大怀疑，防止出事。他的阶级本质是农奴主，在公安部就有问题。不应让他搬回去，怕他销毁证据。他要儿子学射击，家里那么多电话机子，十几条枪，总参总政要抓警卫工作，特别是林的安全。”“这个人是没有改造的人。”

聂荣臻称：“这个人的弱点，长期以来看得很清楚，过去谅解，现在看不是作风问题，他自己不舒畅，我想找他说，说不进去。我们按党的组织纪律办事。对罗丝毫不能存在幻想，丝毫不能让步，让步军队就要变色，适当的时候要作出结论，将来下放不能到大三线。不要看他的表面，要看到他的本质，他是个危险人物，要防万一，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刘伯承称：“对这个人不要低估了。”

陈毅称：“到一定时候，要面对面的斗争，要搞突出政治，两条路线的斗争，第二是伸手。”

徐向前称：“这是个危险人物，林总都不在话下，我们更不在话下。专门出风头，到处演讲。”

[6 6 0 0 4] 林彪就罗瑞卿问题作指示

2月8日，林彪就罗瑞卿问题作指示：“这是个危险人物，他是不会承认错误的，承认了也是假的，不会真正的承认。他跟一般的好同志不同，他要报复，反扑的。这个炸弹不搞掉，将来第二次爆发更难说。在战争爆发时，在党和国家发生困难时，他要造反的。这个人比彭、黄危险得多。不要小看，不能放松对他的警惕性。他到处欺负人。他的思想与阶级本质是农奴主，野心很大，先夺军权，然后夺政权，元帅都不在话下。他要造反的，不能放松警惕。要长期管制，到下面去，在党和群众的监督下进行改造。放松了警惕将来会出乱子的。他跟其他同志犯错误不一样。如果第二次爆炸，他要炸掉我们的国防，炸掉我们党的团结。要打他的张牙舞爪，要消毒。把材料整理出来，军一级都要看。有些材料编出来，搞十条、二十条。批判以后不要留在北京，下放，不要放在大三线，十年也不能来北京。这是个危险人物，危险的炸弹。毛主席、刘主席健在，他搞野心阴谋，如果党发生了困难，他就会造反、出乱子的。”

[6 6 0 0 5] 叶剑英、杨成武向毛汇报军事工作和批罗问题的准备

2月21—22日，叶剑英、杨成武向毛泽东汇报军事工作。22日，遵照邓小平的指示，叶剑英、杨成武向毛泽东汇报关于揭批罗瑞卿问题的准备并听取指示。叶、杨汇报了准备召开小型会议，面对面地批判罗瑞卿的问题。叶汇报了会议领导小组的组成、会议的开法和主要解决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无组织纪律、个人主义思想作风三个方面问题，并做出结论。杨报告了2月上旬在广州时军委各位副主席对罗瑞卿问题的看法和意见。毛表示：我赞成。

[6 6 0 0 6] 叶剑英、萧华、杨成武谈批罗准备

在向毛泽东汇报后，叶剑英称：“揭露这件事是空前的，这件事的危险也是空前的，事情的恶劣性质也是空前的。公开在林总面前要国防部长，病人要像病人的样子，不要挡路啊！我是当接班人的。林告我后，我对他的认识一百八十度转弯。这种人有了军权就要夺党权，已经是书记、副总理，还要什么，这是大地主思想的集中表现。要用这件事教育全党全军。要把这个仗打好，要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三个主题，其他问题就不搞了。材料要一件件落实，做到无懈可击。要明了罗的本质，明了罗的事实，还要明了中央的意图。毛主席说，搞这种事的人，总有一伙人。”“不可能希望他会好转，这不是一般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人不能拿枪杆子，也不能做单独负责的工作，只能在党和群众监督下做些具体工作。要看透他的本质，要到劳动中去改造。”“要狠狠地斗，对这种人就是要残酷无情，他对我们，对林总残酷无情嘛！我们自己有了错误，就作自我批评，通过自我批评，揭露他更有力，搞得才深。”

萧华称：“这个人是没有改造好的大地主。有些枝节问题不要在会上讲，重要问题是突出政治，组织纪律，个人主义，向党伸手。要讲的问题，都要有充分准备。在大是大非面前，我们的态度要非常明确，不能有任何自由主义，不能有任何的幻想。这个人是个纸老虎，戳穿了就是这么回事。”

杨成武称：“主席说，他又犯了彭德怀的错误，罗在高、饶问题上实际已陷进去了。罗是个野心家，罗把林彪同志实际上当作敌人看待。林彪同志带了几十年兵，难道还不懂什么

是军事？什么是政治？军事训练几个月的兵就可以打仗，过去打的都是政治仗。主席说，要恢复林彪同志突出政治的原稿。罗把林彪同志实际当作敌人看待。罗当总长以来，从未单独向林请示报告过工作，罗不尊重各位元帅，他又犯了彭德怀的错误。罗在高饶问题上实际陷了进去。罗个人专断，罗是野心家。凡是要搞阴谋的人，他总是拉几个人在一起。”

杨成武称，“毛泽东明确地指出：‘军委应当恢复林彪同志突出政治的原稿，不允许再另外搞一套和林彪同志相对立的东西。’”

杨成武最后称：“要注意防止罗的地下活动，注意搞‘八司马’。主席问许世友有多少兵？（许答有五十万）靠不靠得住？军以上干部靠得住靠不住？北京发生政变怎么办？人家把主席、刘主席暗杀了怎么办？什么人看林总，什么人哭了，他都知道。他对特务老婆（余注：指罗的前妻）讲，你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你要我到那里去，我就到那里去，解放以后又和她见面了。刘主席说他没有阶级性，没有党性，反对林，反对中央。总理说反对林，就是反党，反毛主席。”

[6 6 0 0 7] 京西宾馆会议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中央常委的决定，3月4日至4月8日，在北京召开由邓小平、彭真、叶剑英三人负责的解决罗瑞卿问题中央工作小组会议。会议由叶剑英主持。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上海会议的继续。上海会议没有来得及对罗瑞卿作出政治结论和组织处理，京西宾馆会议则需对此作一了结。

会议筹备期间，2月19日，萧华布置：“搞三个问题，突出政治，组织纪律，思想作风，主要是突出政治，抓根本性问题，不抓枝节问题，”“材料准备要充分，不准的删去，防他在材料中抓辫子。选突出政治的材料，先让他看，讲话的人不在多，会议要有录音。”“突出政治方面的问题由刘（志坚）、唐（平铸）等四人准备，张宗逊谈比武……”

3月1日，林彪指示：“彻底揭露，彻底批判。其他问题甩开，集中力量开好这个会。肃清党内的危险分子，去掉军内、党内的大炸弹、大地雷。”

3月4日上午，邓小平在怀仁堂主持工作小组会议，对会议的开法和指导思想作了明确指示：

小组成立会，开张，还不是正式进行工作。

小组42人。为什么成立小组，为罗的问题。12月中旬在上海谈了这个问题，根据主席指示，背靠背的方法，罗没有跟大家见面。常委指定恩来和我与他谈，把会议的情况告诉他，要材料看，没有记录。这次会议就有记录，上海会议个人也不搞记录。开始讲了五点，常委、主席说的，一个是问题性质是严重的；二是区别于彭黄；三是一分为二；四是方针，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五，主席说有内疚，要负责任，常委同志和书记处说也有责任。

这个问题我们没有察觉，感到有责任，告诉了罗，罗对这个问题表示不同意见，主要是对抗林总、政治挂帅、封锁，与老师的关系。有很多理由，说不是事实。既然那方面的问题不说，罗在五个方面有错误：一是关系问题；二是作风问题；三是思想意识问题；四是工作做得不好；五是组织纪律。这五点，每点罗都承认有缺点，但都有辩驳。在上海，常委、主席决定，不谈上面那些问题，就这五点。担任军队工作不适当，多方面的工作不适当，同志

们的意见也很多。方法是调离军委系统的各项职务，罗本人写了封信，后来发了个通知，没有讲任何理由。

这个问题不能说已经完了。上海三个小组分别进行，但还没有完。常委、主席指示恩来、我、彭真继续处理这个问题，帮助罗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在上海说过，还有谢（富治）、陶（铸）、李（井泉）也说过。回北京后，彭真、富春、恩来、我都谈过几次，帮助他认识错误的严重性。军队的同志传达了这个问题。政工会议势必接触这个问题，而且很强烈。罗觉得不如大家讲的那么严重，总觉得有出入，实际上有委屈的情绪。这个问题怎么办？根据党内历来的办法，摆事实、讲道理，讲清楚嘛。罗区别于彭（德怀）黄（克诚），彭黄的问题也采取这个态度，对王明也采取这个态度……可先让同志们把对罗的意见讲完，也允许罗把自己意见讲出来。最后怎么样，总有一个统一的看法，中央作出自己的决定。

……

还背靠背就扯不清了，还是要议论。统一看法得不出来，不如花一点时间，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在主要问题上搞清楚，枝节问题、无关紧要的问题，扯多了没有意义，特别是对方针、原则性的问题，大家要扯清楚。根据常委的讨论，向主席报告了，主席同意，考虑需要两步，一步上海式，一步是在一起谈一谈，包括各方面的负责同志，各军区都有人，说清楚对军队的工作也有积极的作用，对毛泽东建军方针、建军路线有益处。42个人说这个问题，主要问题不用很长时间，可以告一段落。实事求是，对罗也是一看二帮。任何人要革命，允许他们申辩，彭还有个万言书……

42个人的小组，并不是哪个为一方，罗也是小组成员之一，有话就讲。

会议进程，中央决定由彭（真）、叶（剑英）、我三个人主持会议领导小组。我们事情多，到外面去跑，总理要出去，不能靠我们天天搞。另外成立工作小组，叶（剑英）、谢（富治）、萧（华）、杨（成武）等七人，叶领班。我们有空就听听汇报。

已经发了十个文件，看一看。开始有些同志讲一讲，领个头，然后罗讲一讲。两面的意见登出来，大家好议。

3月4日下午，会议移至京西宾馆。

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历时13天，参加成员包括军委各总部、公安部、国防工办、国防科委、军事科学院和大部分军区、军种、兵种的负责人，以及罗瑞卿本人，共42人。会议开始阶段，邓小平、彭真参加。这一阶段会议，“对罗瑞卿同志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3月12日，罗瑞卿作第一次检讨发言。至3月16日，发言批判罗瑞卿的共23人。3月17日，中共中央指示，扩大会议范围，请中央、国务院有关各部委及各大区中央局和有些军区、兵种、学院等派人参加。会议通知罗瑞卿休会两天后再继续开会，罗瑞卿3月18日晨跳楼自杀。“因为摔伤住了医院，罗就不能参加会议了，以致会议又由面对面，转为背靠背。”

3月22日开始，会议进入第二阶段，根据中央指示，增加了53人，包括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委和各中央局的负责人，第一阶段未参加会议的军区、兵种、军事院校负责人。第二阶段参加会议的共95人。

会议期间，谢富治、萧华、杨成武（与王尚荣、雷英夫联名）作了主要发言。杨、王、雷的联名发言称：“罗瑞卿同志的错误，不是一般性质的错误，不是偶然性质的错误，不是个别问题的错误，不是盲目性质的错误，而是路线错误，是篡军反党的阴谋活动。他妄想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我们军队，他企图通过各种阴谋手法，达到篡军反党的目的。我们和他的斗争，是党内、军内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是革命不革命的斗争，是一场大是大非的斗争。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党中央召开的上海会议和这次召开的小组会议，严肃认真地揭发和批判罗瑞卿同志的错误，是非常必要，非常适时，非常英明的。我们完全赞成，坚决拥护。”

[6 6 0 0 8] 叶剑英的总结性发言

京西宾馆会议的绝对主角，是主持会议的叶剑英。他在会议结束时的总结性发言中称：“‘将军一跳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这是我套用稼轩词句，把‘百战’二字改为‘一跳’，为罗瑞卿跳楼所哼的悼语。我认为他的政治生命已经死亡了。如果要重新作人，必须真正地在政治上脱胎换骨！会议从三月四日到四月八日，共开了一个月又五天，参加会议的共九十五人。除事假病假外，发言的同志有单独发言的，有联合发言的，共有八十六篇发言稿。从全部发言中可以看到，同志们对罗瑞卿同志的错误，有揭发、有批判、有建议。差不多全部的发言，都肯定罗瑞卿同志的错误，最主要的是篡军反党。认为罗瑞卿同志在工作上犯了这么大的错误，又加上跳楼自杀的叛党行为，已经不能继续摆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岗位上了，应下放改造。”

叶剑英在总结发言中列举了罗瑞卿“篡军反党”的“事实”。这些“事实”的纲要是：“（一）罗瑞卿同志是反对毛主席的，是反党的。”“（1）他反对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2）他反对毛主席关于人民军队的建军路线。”“（3）他反对毛主席人民战争的思想。”“（4）他反对毛主席的战略思想。”“（5）他歪曲贬低毛泽东思想。”“（二）罗瑞卿同志是反对林彪同志的，是要篡夺军权的。”“（1）他对林彪同志欺骗封锁，当面拥护，背后搞鬼。”“（2）反对林彪同志关于突出政治的指示。”“（3）他恶意地攻击林彪同志提出的四个第一。”叶剑英接着称：“（4）他把林彪同志当作敌人，公然伸手抢班夺权。罗瑞卿同志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恶性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不可免地去向党伸手。他私自封官许愿，拉拢一些人，为他效劳，派人当“说客”，以林彪同志迟早要登上政治舞台为名，劝林彪同志让权。此外还亲自出面，当着林彪同志的面大喊大嚷地说：“病号嘛，要象个病号样子嘛！要让贤嘛！”“不要挡路！”最后还想乘林彪同志有病，把林彪同志气死、逼死、折磨死。其实林彪同志的身体，据医生多次检查的结果，内脏各部都是很好的，只是负伤以后神经功能有点毛病，现在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这是全党全军一个喜报。而罗瑞卿却说想不到这个人还能东山再起！使罗瑞卿大失所望，啼笑皆非。这个人还能算是我们的同志吗？！”“他拼命反对林彪同志，绝不是什么个人恩怨。罗瑞卿同志跟了毛主席近四十年，受过毛主席许多年的言教身教。在近四十年中，也在林彪同志直接领导和指挥下做过许久的的工作，耳濡目染，宁有几人？罗瑞卿同志当总参谋长也林彪同志和总理推荐的。林彪同志信任他，放手让他工作，对他工作中的错误，多次批评，诚心教育，忍耐等待，足足六年。罗瑞卿同志对林彪同志的批评、指责、教育，如果自己认为有委曲之处，何以不报告毛主席？而竟同刘亚楼等同志密谈！跟毛主席几十年，还不把毛主席看作父兄师长。难道这样做，不是有意背着毛主席，故意和林彪同志作对吗？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战友，毛泽东思想学得最好、用得最好、跟得最紧。他对党忠诚，对同志和善，几十年刻苦自厉，好学不倦，带病不休，一生以毛主席的理论与实践为准则，他是我们全党最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林彪同志受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委托，主持军委的工作。在罗瑞卿同志看来，不反掉林彪同志，就不可能实现他篡军的野心。我看这就是罗瑞卿同志拼死反对林彪同志的根本原因。”

[6 6 0 0 9] 中央批转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

4月12日，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联名（邓小平执笔）将中央书记处会议情况及《中央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通知稿》、《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一并报告在杭州的毛泽东。信中就解决罗瑞卿问题称，“关于罗瑞卿同志的问题，4月8日已经结束小组会议，工作小组起草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征求了会议各同志的意见，没有采取会议通过的方式。现将这个报告和中央批语草稿送上，请你看看是否可以。我们已在会议上宣布，这个报告须经主席、常委和林彪同志审阅后定稿。”4月14日，毛泽东复周、邓、彭：“四月十二日的信及附件，收到阅悉。”毛对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通知稿作了精心修改，对《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则没有改动。

4月24日，在毛泽东主持的批判彭真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结束当天，叶剑英、萧华、杨成武、刘志坚联名致函毛泽东及中共中央，揭发“彭真同志在批判罗瑞卿会议过程中的恶劣表现”。

5月16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的同一天，中央批转了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中央批语称，“中央认为，罗瑞卿同志的错误，是用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错误，是用修正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彪同志的错误，是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篡军反党的错误。”“鉴于罗瑞卿同志的错误极端严重，中央决定停止罗瑞卿同志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以后再提请中央全会决定。”“为了教育干部，吸取教训，并肃清罗瑞卿同志错误的影响，中央决定，将中央工作小组的报告和中央的批语，发到县委和团级党委，这个报告所附的叶剑英、谢富治、萧华、杨成武等同志的四个主要发言，罗瑞卿同志三月十二日的检讨，以及叶剑英、萧华、杨成武、刘志坚同志四月二十四日向主席、中央的报告，发给地委和师级党委，口头传达到县、团级党员干部。”

[6 6 0 1 0] 周恩来、彭真谈京西宾馆会议

京西宾馆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彭真均对会议及中央工作小组的报告予以肯定。周恩来称：

这个会开得好，同意工作小组的报告。林总揭发了罗的反党问题，主席亲自抓了这个问题。罗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野心家。他有修正主义思想，他是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他坚持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必然反对无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四个第一，反对突出政治。个人主义到了一定气候就要向党伸手。

主席提出接班人的问题，在车上同罗说了这个问题，我们得到教育。主席想到全世界，想到后代，是个伟大的思想，还想出大小三线、地方武装、战略方针。罗听到了这几条，得到法宝，到林总处要他让贤，不能等待了，逐步升级，自然流露。大比武外出十三次，原子弹爆炸他都不回来，别有所好。另外搞一个东西，得意忘形，正中下怀。他把主席的伟大思想当作他肮脏的个人欲望，到了一定时候就向党伸手。我支持这个会议，讲一点历史教训……。

解放后六年一次，高饶、彭黄、罗。当时搞宪法，高岗想当部长会议主席，夺权。主席要到第二线，少奇到了第一线，他就向党伸手（53年）。彭黄是在党遇到困难时，总理不

在话下，直接与主席较量。彭德怀59年周游列国回来，在庐山会议，时机到了就伸手。这次是在64年，主席讲了接班人，罗瑞卿得意忘形，他就伸手了。他对林总是敌对的，反对林彪同志就是反党。

解放后是三次。这次是革命力量大发展，帝、修、反在挣扎，结合在一起。这个斗争要看长不看短，要看大不看小。主席讲大小三线、全民皆兵、备战备荒为人民。罗这个野心家掩盖不住个人的欲望，他不是突然的，是由量变到质变的。他在“遗嘱”中要老婆孩子相信党，自己却不相信。自杀是反党行为，两封信就是反党。党是很信任他的，给他很高很大的职务。常委是有责任的。我们接触多，没有察觉出来。彭德怀有不同意见还可以保留。罗自杀不仅是向党示威，还说明他有不可告人的目。双脚下地是不是自杀，还要继续查。

彭真称：

这次会议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其实他一跳就作了结论。目的是为了消毒。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是军队，军队一定要掌握在忠实于党的人手里，决不能掌握在罗那种人手里。用这件事作反面教员来提高我们的觉悟，把我们头脑武装起来。这个会开得好，方法好，领导得好。有人说太文了，我们是抓大问题，不抓细节，表现了高度的原则性和严肃性。材料不可靠的就不要，和风细雨，摆事实、讲道理。罗善于造谣、抵赖，在铁的事实面前他无法抵赖。我们这样做，不是怕伤了他，而是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坚持处理党内问题的方针、政策和作风。我们的事实根据够不够，会不会有点出入，有一点出入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主要的问题、根本的问题是可靠的，用不了的。将来是不是罗会说冤枉了他，我看不冤枉他。说他是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毛主席军事路线，反对四个第一，说他是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品质恶劣、逼林总让位、篡军反党，是不是事实，这些问题也是逐步升级的。他能推翻哪一条，我们可以取消。但是根本的、主要的问题，恐怕是准确的……。

胜利以后党内出了不少问题。六年一次，有点偶然性，但也是必然的。它是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一百年，几百年都会有。罗的错误性质是资产阶级性质，过渡时期主要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赫鲁晓夫、铁托……都是资产阶级的。吴晗这个人是反党的，我和老虎在一块睡觉，也未察觉。阶级斗争反映在各个方面，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我们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党，是战无不胜的。

[66011] 总政整顿机关，批判梁必业

3至4月京西宾馆会议期间，萧华在会议发言中点了总政副主任梁必业的名。萧华称，“梁必业同志和罗瑞卿同志的关系也是很不正常的。”“梁必业同志跟罗瑞卿同志跟得很紧，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和罗瑞卿同志一唱一和，对林彪同志突出政治的指示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

2月至5月，总政治部“整顿机关”。梁必业称：“”整顿工作一开始就风暴骤起。在总政治部党委扩大会上，在多数人不了解真相的情况下，一些人有准备地向我发起突然袭击，从工作中的无端指责，发展到路线性、方向性问题的无限上纲，诬陷我‘积极支持罗瑞卿反对毛泽东思想，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同罗瑞卿勾结在一起，进行篡军反党的阴谋活动’，并编织了一系列莫须有的罪名，连续3个月，对我进行了多次各种类型的批判。”“5月上旬，总政治部召开了副处长以上的干部会议。会议在对我进行了又一轮批判之后，按照事先准备好的稿子，给我横加上种种罪名，并宣布建议撤销我党内外一切职务。6月2日，总政治部发出通知，将《关于总政治部整顿机关和梁必业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印发到全军师以上单位，口头传达到团一级党委。此外，还对我所谓‘篡军反党的罪行’进

行了‘彻底清算’。6月17日，总政治部秘书处发出《关于今年清理销毁〈工作通讯〉的通知》，要求将总政编印的《工作通讯》第191期以前的，凡是由罗瑞卿、梁必业签发的文件一律销毁，‘文件中提到彭真、罗瑞卿、梁必业名字的，或有他们讲话内容的，一律涂掉或剪掉’。‘文革’开始后，我完全‘靠边站’，并陷于无休止的关押和批斗之中。”

〔66012〕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依照毛泽东4月间在杭州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作出的部署，5月4日至26日，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毛仍在杭州，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会议情况则由康生负责向毛汇报。

会议主要目的是集中揭发批判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4人的错误，讨论并通过已经毛泽东修改的中央关于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的通知。

参加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12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董必武、陈毅、李富春、彭真、贺龙、李先念、谭震林，候补委员5人：乌兰夫、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薄一波。列席63人，其中军队12人：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萧华、杨成武、王新亭，副总参谋长李天佑，“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成员刘志坚、陈亚丁，国防工办常务副主任赵尔陆，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北京军区第二政委廖汉生。

5月4日，会议开幕。刘少奇主持，邓小平讲话，说明会议的开法。康生说明毛对通知草稿的修改情况。5月5日下午，第一次座谈会。由叶剑英主持，康生介绍情况。5月6日上午，第二次座谈会。由李富春主持，康生继续介绍情况。5月6日下午，第三次座谈会。叶剑英主持，张春桥介绍《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写作过程。5月7日上午，第四次座谈会。李富春主持，陈伯达介绍情况，谈彭真在历史上的错误。5月7日下午，第五次座谈会。李雪峰主持，萧华介绍情况，谈彭真在东北问题上的错误和批判罗瑞卿会议过程中的错误。

萧华在谈及彭真在批判罗瑞卿会议过程中的表现时，称彭“不准写罗和杨尚昆、杨献珍、刘亚楼、萧向荣、梁必业等极不正常的关系”，“对杨尚昆的问题，办了两年没结果，就是因为彭、罗自己有鬼”，“到会同志对罗越权越位对地方工作横加干涉，横行霸道，很有意见，揭了很多这方面的问题，富春、陈毅、先念、震林、富治等同志对罗的这种做法非常不满。”

萧华在发言中还称：“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最近几年来，主席又反复地提醒我们说，党内是不太平的，党内出了乱子怎么办？会不会出修正主义？并一再问大家，他的这些话传达下去没有？去年上海会议后，主席又问许世友同志，假如北京发生了政变，你怎么办？主席说，出修正主义不只是文化出，党、政、军也要出，主要是党军。这是最危险的。”

5月10日至14日，各小组以小组会形式，讨论中央通知稿及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

5月16日上午，刘少奇主持全体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通知》和同意批转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

讨论通过的《通知》开头即称，“中央决定撤销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毛泽东4月在杭州为《通知》所加写和改写的两段涉及“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重要文字，也毫无悬念地被会议一致通过：“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化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5月16日下午小组会，杨成武在第二组发言批判彭真。杨讲了三大点：一，彭真在晋察冀的错误；二，彭真在批判罗瑞卿的会议过程中的恶劣表现；三，彭真极力插手军队工作。

5月18日，刘少奇主持全体会议。林彪在会议上作了长篇讲话。林彪讲话的前半部分，列举了古今中外的大量事例，尤其针对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问题，对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防止“修正主义篡夺领导权”、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反革命颠覆”作了阐述。讲话后半部分，林彪强调了全党“要以毛主席为中心来团结，以毛泽东思想为中心来团结”，强调“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我们也拥护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要永远流传下去。”“毛主席活到那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5月19日，中共中央《通知》以中发〔66〕267号中央文件下发党内。该文件有六个附件，其中附件一《中央批转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及附件二《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与《通知》一并发到县委、文化机关党委和军队团级党委。附件三《萧华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附件四《杨成武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小组会上的发言》、附件五《关于彭真同志在国际活动中的王明路线（刘宁一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小组会上的发言）》及附件六《关于彭真同志错误的一批材料》于1966年6月19日发到地委和军队师一级党委，口头传达到县、团级干部。

5月21日，刘少奇主持全体会议。周恩来发言讲了三个问题：（一）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二）领导和群众问题。（三）保持晚节问题。在讲到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时，周恩来称，“同意许多同志的讲话。完全同意林彪同志的讲话，讲的很好。”周恩来又称：“彭、罗、陆都是得到中央信任各霸一方，对彭是逐步认识的，对罗也是逐步认识的，罗是林总发现的，彭也是林总发现得最早，林总在东北讲的三句话最生动，最形象：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两面三刀，没有章法，本质是政治掮客，投机分子。他们是在国内外形势大好的时候搞起来的，他们三人在党内地位相当高的，罗实际上是国防部长（因林彪病），彭实际上是第二书记，邓小平对他很放手，为什么他还要伸手，他们是资产阶级野心家，从最近二十

三条下达后，彭打出反左的旗号，完全取消四清的一条黑线，不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5月23日上午，刘少奇主持全体会议。主要是批评朱德，并通过对彭、陆、罗、杨组织处理及一些人事安排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决定：（一）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停止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职务，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和决定。（二）撤销彭真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撤销陆定一的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职务。（三）调陶铸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并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调叶剑英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兼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他们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和决定。（四）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

通过上述决定，叶剑英成为军内人事调整的大赢家。他的实际作用，超过了聂荣臻、徐向前、刘伯承，甚至超过了党内地位比他高但在军内已无实权的贺龙。

5月24日上午，刘少奇主持全体会议。会议决定，“中央成立专案审查委员会，进一步审查彭、陆、罗、杨四同志的反党活动和他们之间的不正常关系。”

[6 6 0 1 3] 毛泽东与胡志明谈及林彪、彭德怀、彭罗陆杨

6月10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秘密来华的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与其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毛谈及了接班人问题，并多次提及、赞扬了林彪。毛称：

“后头又有几次，遭到内部同志们不谅解，把我赶出红军。当老百姓了，做地方工作，在福建。那时，林彪同志同我一道，赞成我。他是在朱德领导下的队伍里，他的队伍拥护我。我自己的秋收暴动的队伍，却撤换了我。同我有长久关系的撤换了我，同我不大认识的拥护我。你看，怪不怪呢。”

“中国现在也出现了修正主义，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都是你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你不是问，以前我们知道不知道？我们是知道的。彭真犯过一系列的错误，早几年我已经要撤他。北京市是个独立王国，谁也不能过问。比你们的河内坏。我不能过问，刘少奇同志不能过问，周恩来同志不能过问，邓小平同志不能过问。罗瑞卿的问题，一九五九年整彭德怀时，有人提议他当总参谋长，我们有些人不赞成。后来，提他当总长的同志就挨他整，一共整了六年时间。提他的人是他的上级，现在反过来挨他整。我劝你，你们的人不是都忠诚于你的。忠诚的可能是大多数，但小部分可能是只在口头上叫你‘万岁’，实际上是希望你早死。他叫你‘万岁’时，要注意，要分析。越是捧你的越靠不住。这是很自然的规律。一个党不分裂？没有那回事。”

“彭德怀是国民党的团长，同我们打过仗，后来投机；历来都犯路线性的错误。罗瑞卿是同彭德怀合作过的。彭德怀、罗瑞卿、彭真、陆定一、杨尚昆，他们都是一伙，为什么这么久才揭露？我们是要看一看。他们还里通外国。”

[6 6 0 1 4] 刘少奇谈彭罗陆杨问题

6月27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谈及彭罗陆杨问题时称：

罗瑞卿是军委总参谋长。国防部部长是林彪同志。但长期生病，经常工作实际上是由他来的，可是他还是不满足。林彪同志在军队里威望比罗瑞卿高得多，林讲话，大家都照

办，这就触犯了罗瑞卿，认为干扰了他。他不愿意让林彪同志‘干扰’国防部、总参谋长的工作，因此，林彪讲几句话，他就跳起来了。他要逼林彪同志让位，他长期不把国防部的情况向林彪同志报告，别人去向林彪同志汇报，他反对；林彪同志找人谈话，他也反对，甚至采取了恶劣手段反对林彪同志，可以说是虐待一个病人。

他反对毛主席的军事路线，毛主席在军事问题上，有一套完整的路线，林彪同志和毛主席的军事路线是一致的，并且有些发展，罗瑞卿是反对毛主席的建军路线，反对突出政治，要突出军事、突出技术，或者政治、军事、技术都要突出，他是折衷主义，实际上是反对突出政治。他在军队中企图实行一条资产阶级的军事路线。此人盛气凌人，锋芒毕露，对老的元帅、老干部，都加以打击，他是专搞一言堂的，不听别人的意见；他到处伸手，干涉地方工作；到处突出个人。

罗瑞卿问题是在去年十二月揭露出来的，并作了处理，是毛主席亲自处理的。处理以后，在今年二、三月间，召集了有地方、军队干部参加的几十个人的会议，进一步讨论罗瑞卿的问题，他在会上讲了一次话，大家不满意，没有让他过关，他就跳楼自杀，受了点伤，没有死，现在住在医院里。他的这种行动，是對抗情绪，是严重地對抗党，對抗同志的批评。在这次会议作出决议的过程中，发现了彭真在关键问题上包庇罗瑞卿，这暴露了彭真、罗瑞卿之间的不正常的关系。

□ 原载《新史记》第26期，2015年6月

~~~~~

【春秋史笔】

张春桥为什么摧折周信芳

• 金大陆 •

—

2015年1月，为纪念京剧艺术大师周信芳诞辰120周年，由文化部、上海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了“麒艺流芳”系列活动。张春桥在文革中折辱这位麒派大师的经过和深层原因，值得重新反思。

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张春桥即指示《文汇报》驻京办事处注意收集反映。不久，传来吴晗委屈的声音，提出上海的周信芳在1959年就率先创作了京剧《海瑞上疏》，并在上海庆祝建国十周年的舞台上进行公演。张春桥接报后，赶赴上海京剧院，当众斥责周信芳演出《海瑞上疏》是“为民请命”，指认戏中出现的大雨伞，就是“为民请命”的“万民伞”。同时布置徐景贤领衔的写作组，撰写批判《海瑞上疏》的文章。

张春桥为什么如此急迫呢？显然，周信芳的《海瑞上疏》在张的职责管辖之内是理由之一。更紧要的则是批判《海瑞罢官》的矛头针对吴晗背后的“司令部”。所以，其蕴含的政治目的既不能因京剧《海瑞上疏》而引向戏剧学术思想的讨论；更不能因上海周信芳而遮掩和分散对北京吴晗的瞄准。所以，必需将两者捆绑在一起，甚或强调南北呼应，将吴晗推到更突出的位置上。当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注1）同日，毛泽东还说：“《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

底的卖国主义。”毛泽东的谈话不仅是对《海瑞罢官》和吴晗的定性，也是对这场批判运动的定性，周信芳的《海瑞上疏》在劫难逃。

1966年2月12日，《解放日报》发表了署名“丁学雷”的文章《〈海瑞上疏〉为谁效劳？》，5月又发表了署名“方泽生”的文章《〈海瑞上疏〉必须继续批判》。该报“编者按”指出：《海瑞上疏》和《海瑞罢官》是“一根藤上结的两个瓜”，是配合“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和社会主义疯狂进攻”。如此，周信芳便被打入了“牛鬼蛇神”的行列。

其实，《海瑞罢官》和《海瑞上疏》都是奉旨之作。1959年4月，中共中央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举行，毛主席在会上倡导为坚持真理而“五不怕”。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在上海锦江饭店约见上海京剧院院长周信芳，并送《海刚峰奇案》、《丘海二公合集》两书，建议上海编演一部“海瑞戏”。周信芳接受了建议，率京剧院编创新编历史剧《海瑞上疏》。该剧列为国庆十周年献礼的重点剧目，于1959年9月30日，首演于上海天蟾舞台。周信芳以精湛的麒派艺术，塑造了海瑞的舞台形象。继而，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紧随形势，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等文章，并与马连良联手编演了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一南一北的呼应，就是为了迎合毛泽东赞颂的“海瑞精神”。殊不知，情随事迁，云谲波诡，奉旨之作竟成了“继续革命”的祭品。

## 二

1966年6月1日，经毛泽东批示北大聂元梓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在全国广播后，文革从高层政治博弈进入了全面发动群众的阶段。上海各高校学生纷纷上街游行声援北大。同时，揭批本校“牛鬼蛇神”的大字报亦纷纷上墙。6月2日，上海市委成立了文革领导小组，张春桥兼任组长，姚文元、徐景贤等为组员。市委部署在各部、委、办、区、县、局、大专院校、科研所成立文革领导小组，在各单位党委领导下开展运动。（注2）6月10日，上海市委召开全市17级以上党员干部万人大会，动员全市党团员及广大群众，“最坚决地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斗号召，把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张春桥与曹荻秋、马天水等出席大会（注3）。会上，抛出了周信芳、贺绿汀、周谷城等八位“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周信芳成为上海文革中第一批被打倒的“老虎”，连续遭遇隔离、抄家、批斗，1967年1月，在上海“一月夺权”的风潮中，周信芳还被押上无轨电车空中线路修理车上，在全市游街示众。

如果说，这是通过打倒“死老虎”，企图显扬并证实文革运动的成果。那么，形格势禁，随着各种代表人物、各种利益群体、各种社会力量，在此“革命造反”的舞台上上上下下，至1967年下半年，文革运动的整体态势已日趋复杂化了。1967年10月14日，张春桥亲赴上海京剧院强调“周信芳是到死也不会改变的，重点应搞周信芳”（注4）。之后，张春桥还于10月16日全市报告会上、11月19日和25日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连续四次点名批判周信芳。周信芳早因文革初期的“海瑞戏”而成为“死老虎”了，张春桥为何还要在这个时候，将周信芳挂在炮口上呢？原来，“死老虎”可以成为“活靶子”，可以成为转移方向，化解造反派内部裂痕的借端。

就此，张春桥借批判周信芳，向上海的造反派谈了三个问题：

其一，“文艺界阶级阵线不清”，尤其在上海京剧院，“那里周信芳的势力根本没有打下去”，而两派小青年“双方的人就干呀，整天斗。那能斗出个什么结果来？这样消耗了我们革命派的精力。”（注5）“你们两派青年斗，把个周信芳放在一边没人管，周信芳就舒服极了”（注6）。所以，张春桥指示：既然两家“都是忠于毛主席的”，“关起门来，咱

们两家开一个会”，通过“斗周信芳，在这样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在张春桥的布局中，打周信芳这个“靶子”不是要害，更不是目的。而要害是尽快结束造反派之间的“内斗”，目的是联合起来，以稳定局势。

其二，“斗周要与刘邓陈曹联系起来”（注7）。张春桥说：“陈丕显、曹获秋根本不认账，什么都要翻案。我们的同志对这些问题不关心了。”“这就不是乱了敌人，而是乱了我们自己”。（注8）其实，刘邓之案在中央，对从上海起家的张春桥来说，陈曹之案才是他的心头之患。以至张春桥数次在电视直播中，察看陈曹的表现，并认为一年多来，他们的“本事也学会了”，“反正不跟你顶牛，辩论”。比如你问一个问题，“他就说：我不记得了，请你们揭发。”张春桥说：要允许陈曹申辩，否则就“没有味道了”。缘此，张春桥承认陈曹“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我可从来没有轻视这对手。”（注9）周信芳已无足轻重，通过周信芳指向陈曹则此事体大。

其三，11月23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决定将修改党章（草案）任务交给上海，并连夜电话通知在沪的张春桥。25日，张春桥即宣布成立“上海党章修改小组”，张任组长。张春桥在会上说：新党章由上海写出后，上报给中央，再发动全国讨论，交给“九大”通过后，就“成为今后中国共产党共同遵守的规章”（注10）。至于为什么交托给上海？张春桥强调：上海是毛主席的“可靠根据地”，是“党中央、毛主席的得心应手的工具，主席的一生想法能在这里实验”。（注11）至于修改党章的指导思想，张春桥说：文革“这一年半来，对党来说，就是一个整党、整政、整军的运动。”而“中心活动还是整党，因为党是工人阶级的最高形式。”张春桥解释：主席提出“吐故纳新”，说明“我们党至少是一部分单位要重建的”，所以整党“也有一场激烈斗争。”（注12）接着，张春桥又把“死老虎”周信芳当作“活靶子”揪出来，声称刘邓陈曹把“周信芳这些乌龟王八蛋也拉进党里来”，整党就是要“抱着严肃的阶级斗争观点”，清除这些人。同时，希望“如果愿意继续做党员、团员的”，“就严格地要求自己，和造反派站在一起”。（注13）至于造反派中的非党员，何时“加入到毛主席的党里面来”，这关系“工人造反派的阶级队伍的建设，阶级队伍好了，党的问题也有办法”。（注14）所以张春桥说，毛主席称赞了上海的工人阶级。但张以为上海的工人造反派掌权了，有的开车去游泳，有的到外地游山玩水，这“距离主席思想太远了吧！”“我看用不到一年两年就出问题”。（注15）恰如当年国庆庆典时，张春桥看着工人造反派的头头脑脑们，坐着轿车鱼贯而入，曾严厉地质问：是不是明年就要搞“三反”、“五反”运动！

如此，周信芳成了整党的对立面，成了整党“吐故”的对象和“纳新”的警示。实际上，张春桥是借周信芳这个“靶子”，来展开并阐述文革整党的思路——党员要通过整党，在思想上向文革运动的政治路线看齐；准备入党的造反派则要在行为上，坚持为“公”的“党员的标准”，将这两个方面契合起来，目的和路径则是要在“革命”的基础上，重建一个“继续革命”的党。

由此可见，在短短的两个月内，张春桥密集地提吊周信芳，实质上是借助这一个案，根据现实政治的需要，步步紧逼地指点造反派的行动。

1967年12月7日，上海各造反组织联合在上海杂技场召开了全市性的“打倒周信芳”电视斗争大会。终于，周信芳因为“海瑞戏”遭揭批成了“死老虎”；又因张春桥校对文革运动的方向，成了“活靶子”。1968年，周信芳被关进了牢狱，其夫人裘丽琳一病不起，并祸殃儿孙两代，弄得家破人亡。

中共“九大”后，文革运动进入“斗、批、改”阶段。当年9月，张春桥在上海讨论落实“国庆宣传”的任务时，仍不忘在“大批判”中揪住周信芳。张春桥说：当前怎样开展革命大批判？上海正在批判周信芳、贺绿汀、斯坦尼、凯洛夫。但是外国人不宜批得太多，不必要在远程中多花笔墨。（注16）被张春桥称为“南霸天”的周信芳，处于楚囚对泣，束手待毙的境况中。

继而，因毛泽东批示了“六厂二校”的经验，在“清理阶级队伍”等方面提出了“注意政策”、“给出路”等工作要求（注17），上海各方面开始对运动初期及“清队”中揪出来的“叛徒、特务、地、富、反、坏、右”和“走资派”进行甄审，这也就牵涉到了周信芳的定案问题。

1970年6月，有关专案组回复上级诘问周案的情况，称周信芳“戴反革命分子帽子这个问题没有定”，接着，再呈上一报告，称“可以不戴反革命帽子就不戴帽子。”（注18）显然，这应该是周信芳专案组根据形势研判后，向上级报告的意见。6月23日晚，张春桥召集王洪文等讨论周信芳的定案问题，张春桥表示：“别的不要去说他了。就‘海瑞上疏’这一条就是个现行反革命。这样的人，为什么能够不戴帽子呢？实际这种右倾倾向是很危险的。因为如果这个家伙不戴帽子，这个家伙如果是能解放了，那我们还有什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呢？那就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翻了嘛！”（注19）6月29日，张春桥在听取“清队”运动的工作汇报时，再次表态：“我对公安局可有意见了，有些案子一到他们那里就完了！”“周信芳根据什么定人民内部矛盾？我就定他是死不悔改的反革命！”“这种人不在判不判刑，要看效果，这些人社会效果就是反革命，他可能什么组织也没有参加，但他就是反革命，他写反动文章和戏，他是用演戏来反对革命的吆！”（注20）就此，专案组做出将周信芳“定为反革命分子，不戴帽子，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永远开除出党”的结论送审。就是面对这个一曲一折的定案意见，张春桥说：“这个字我不能签！杀了我的头，我也不能承认”，“文化大革命中，上海第二个批判的是周信芳，他和吴晗一样，一根藤上的两只毒瓜，这个《编者按》就是我张春桥写的，照你们这样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重新搞”（注21）。

张春桥在毛泽东“给出路”的示意下，依旧死死地揪住周信芳，要给周信芳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并非因为周信芳的“历史问题”不可解脱，“现行问题”不可饶恕，要害恰恰在于周信芳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动紧紧相扣，即若是周信芳解脱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也就松动了，其性质、意义和结果就有危险“给翻了”。所以，给周信芳定性，就是给文革加锚，不许为文革翻案。

毛主席都表态了，张春桥为何还要如此死倔呢？包括林彪事件以后，毛泽东批复了大量的申诉信，解放了一批文革中被打倒的干部，张春桥仍相当介意。1974年建军节前，张春桥和周恩来、王洪文、邓小平、叶剑英等在京政治局委员，代表中央向吕正操、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宣布平反。接见中，张春桥特别对吕正操说：“你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还是有错误的嘛”（注22）。同年9月，毛泽东批示陈丕显“似可作人民内部问题处理。”

（注23）张春桥一面强调“似可作”，说明陈问题的性质“是一回事，是严重的”；处理则“考虑作为内部问题”（注24）。一面通知上海方面抓紧为贪腐而处理的老造反潘国平等“落实政策”，要让陈看到他的“老对手还在”（注25）

张春桥出于现实政治的考量，就是要在更宏观的方向上集聚文革的政治力量，坚守文革的政治路线。检视文革十年间，中国政坛上各路政治力量的交集和博弈，包括1966年的所谓“资反线”一路，1967年的“二月逆流”一路，1971年的“9·13”一路以

及文革后期的“右倾翻案风”一路，甚或“粉碎四人帮”的一路，几乎都是或抵制、或违迁、或背弃文革政治路线的。只有张春桥、江青等，从策划批判《海瑞罢官》，到主持中央文革小组，再到起草中共九大、十大《政治报告》，确立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体系，始终坚定不移地恪守着文革路线。张春桥在党内、军内并没有功勋，在人脉方面没有实在的资格和地位。张春桥所以能升迁至中央政治局常委，既靠文革运动起家，更靠攀附于江青，领悟并阐释晚年毛的思想，为文革运动做出理论的标示。张春桥的政治生命全部投注于文革中，怎能不要“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呢？张春桥的行事风格是坚决的，这就加深了毛泽东对他的信任。张春桥的行事风格又是没有弹性的，所以毛泽东去世，张在政治上必随之而亡。

现在回到对周信芳的定案问题上。1970年11月，按照张春桥的指令，专案组重新定案指认：周信芳因1959年上演《海瑞上疏》，配合“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向党进攻”和“污蔑江青同志亲自领导的京剧革命，因‘退功’糟蹋演员青春”，而定案为“戴反革命分子帽子，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清除出党，交群众监督批斗”。后因定案的个别措辞没有确定暂缓宣布，1974年3月，王洪文、马天水、徐景贤追查此事，专案组向周信芳作了宣布。

一年后的1975年3月8日，周信芳凄然去世。

注释：

- （注1） 《传达报告整理件》。
- （注2） 《中共上海党史大典》，第119页。
- （注3） 1966年6月11日，《文汇报》。
- （注4）、（注5）、（注7）、（注9）、（注11）、（注13）、（注14）、（注15） 朱锡琪，《工作笔记》。
- （注6） 1967年10月19日，上海市革委会《内部学习文件》。
- （注8） 《张春桥同志在十一月十九日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 （注10）、（注12） 《传达报告整理件》。
- （注16）、（注18）、（注19） 上海档案馆，B92-2-1526；B173-2-88-8；B173-2-88-8。
- （注17） 简称“清队”。1968下半年起始，宣传上强调为建立以“左翼为骨干的无产阶级队伍”，从而“为政权建设、党的建设打下良好的基础”、转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三卷下册，人民出版社，第815页。见1968年5月，北京市革委会，《关于清理阶级队伍工作中几个问题的通知》。实际上，因其斗争目标、专政对象与文革的宗旨并不相符，所以笔者认为：其主要目的应是借助大规模的“清队”运动，来转移全国两派持续武斗的方向，以收拾乱局。
- （注20） 上海“文革”史料整理编纂小组，《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第521页。
- （注21） 《浩劫》，第269页。
- （注22）、（注23） 逢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697页；第1698页。
- （注24） 《陈丕显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62页。
- （注25） 冯小明主编，《中共上海历史实录》，上海教育出版社，第598页。

□ 原载《炎黄春秋》2015年第12期

~~~~~

【自由论坛】

文革五十年祭——互害模式下的中国

• 蒋祖权 •

50年前一场文革，席卷了中国大陆，几亿人口如痴如醉，丧失人格于无形之中，扭曲人性到灵魂深处，人们相互揭发，相互批斗，公开诬陷，大量编造各种无端罪名。被杀者，自杀者，致残者，以千万人为计算单位，而准确数据则永远也无法统计。

1949年以后，随着各种人造运动的不断发明更新，随着各类阶级斗争的不断发展扩大，最后终于升级成为疯狂的文革，也注定升级成为疯狂的文革。

自1966年开始，到1976年结束的十年文革之中，从国家主席到平民百姓，从在校学生到退休老人，都有被揭发，被诬陷，被批斗，被打倒，被打残，被打死的机会。文革之中有上百种五花八门，登峰造极，空前绝后的罪名，总有一款适合你。一句话，一个表情，都可能会成为一种罪行。——文革时期，南疆一单位组织人们向毛主席表忠心，职工李亚长说：“我誓死保卫毛主席，毛主席活，我活，毛主席死，我死，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铁打江山。”因为这句话，他被定成为“反革命罪”。

文革之中，师生同事之间，亲朋故友之间，夫妻父母子女兄弟之间，相互检举胡乱揭发，公开诬陷残暴迫害，置人于死地之举，在此十年之间，变得习以为常。

有些随声附和的人，也只是保了一时的太平，一样躲不过各种突如其来的人祸。有些助纣为虐的人，也只是暂时得势，最后也难免落入自己挖过的陷阱。

谁敢站起来保持独立的人格，谁敢站出来维护生存的尊严，绝对只有死路一条。人性道德的底线，在文革之中被彻底摧毁。

曾任人大委员长和国家主席的刘少奇，无疑是文革之中的关键人物，也是文革这种“政治互害模式”最具说服力的人物。文革前，刘少奇主持批判彭德怀，文革一开始，刘少奇就主持批判朱德。文革之中，极力主张“不要法治要人治”的刘少奇，在尝尽了人治的滋味之后惨死，而因刘少奇问题受株连的案件就有2万6千多件，被判刑的达2万8千多人。当然，一些积极参加批判彭德怀和朱德的人，在随后的文革之中也得到了同样的批判。

文革之中，从美国回来的老舍先生，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和夫人戴淑宛，学贯中西的傅雷和夫人朱梅馥，作家杨朔，女钢琴家顾圣婴与母亲和弟弟，黄梅戏演员严凤英等等，众多文化名人，不堪忍受屈辱与折磨，为了维护尊严选择自杀，愤而离世。

文革之中，陈布雷之女陈琏也选择了自杀。（陈布雷，民国总统府国策顾问，蒋介石的文告和演讲大多出自其手。其文：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曾被广为传诵。其女陈琏，中共党员，1947年被捕，1948年经陈布雷保释。1948年11月，陈布雷自杀）。陈琏怨叹父亲走的是幽明异路，时隔19年之后，1967年11月，陈琏跳楼自杀。

文革之中，和平解放北平的第一功臣——傅冬菊（傅作义之女），也被作为阶级异己分子揪了出来，遭到残酷批斗。文革后，傅冬菊晚景凄凉，病困交加。傅作义的弟弟傅作

恭（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水利工程学博士），被傅作义召回中国大陆，在文革之前的反右运动中，傅作恭与3000名右派分子一起，被押解到甘肃酒泉夹边沟劳教农场，在那里有2500名右派分子被活活饿死，其中就有傅作义的弟弟傅作恭。1974年傅作义病死北京，不知其临终之前曾有何感想。

但是，也有很多幸免于文革的人物，像郭沫若这样的文化人，在文革之中就安然无事。1967年6月5日，在亚非作家常设局举办的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5周年讨论会上，郭沫若致了题为《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的闭幕词之后，感觉到意犹未尽，即席朗诵了一首诗：“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也献给各位同志和同学：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奋不顾身地在文艺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工农兵的英雄形象！我们要使世界舞台也充满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1976年5月，郭沫若写了《水调歌头》批邓。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捕，郭沫若马上又写了《水调歌头》骂四人帮。学术上的东西，郭沫若都写进了《中国史稿》和《甲骨文合集》，人格上的东西都写进了文革。如今像他那般做学问的越来越少了，而像他那般做人的却更多了。

还有像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家，在文革之中也安然无事。大跃进之中，他三次论证亩产万斤，为粮食卫星提供科学依据。文革之中，他为确保卫星能唱《东方红》而砍掉了实验项目。改革之后，他论证人体科学，用党性保证人体特异功能的骗术都是真的。有人说他用党性而不是用人为特异功能担保，还是留了一手的。其实，一位科学家，连续三次鼓吹亩产万斤之后，还有什么人格呢。

——像这样的人，还有很多，有的人今天依然健在。身体虽然安好，良心始终不知，奴性还能自动升级，人格注定早已不在。

文革的尾声，也是令人啼笑皆非。1976年毛主席治丧期间，通知全国停止一切娱乐活动。山西万荣有一家正好赶上儿子结婚，那时办喜事都提前采买肉菜，豆芽，豆腐，粉条等等，即便一家一家通知亲朋改期，买好的菜蔬也没法等，那时没有冰柜冰箱也无法冷藏冷冻，文革年间吃喝困难，这家人只好硬着头皮办喜事。婚礼两天后，公安局来人，逮捕了这家父子。文革之中逮捕人犯都要游街示众，胸前挂一个大牌子，写上罪名，公安局讨论这两个犯人的罪名时，有说叫“随便娱乐犯”，有说叫“破坏悲痛犯”，都觉得不合适，最后大家决定，政委文化水平最高，政委拿主意吧！政委果然不负众望，牌子制作完成，这对父子牌子上的罪名非常醒目——“幸灾乐祸犯”。

——文革的出现，是中国几千年人治社会开始失去道德底线和人性控制的标志。十年文革，如此亿万人之间的互相诬陷迫害，如此任意胡编乱造的大量罪名，如此赤裸裸进行的残酷屠杀（官方统计以反革命罪被处决的就有十几万人），在人类历史之中也是首次出现。

——文革的出现，是中国历史几千年人治时期，在经历了太平天国与义和团之后，没能纠正历史发展方向，没能改进社会管理方式的必然人祸。十年文革，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从此，开启了中国大陆的全民互害模式，文革虽然在1976年宣告结束，而这种在文革之中丧失了道德底线的互害模式不但没有结束，而且开始变异，开始升级，开始进入整个社会的各行各业。

使用苏丹红，三氯氰胺，地沟油等有害物质的人说，这些食品有毒，我不吃，卖给别人吃。使用甲醛，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料的人说，这些衣服可能致病致癌，我不穿，卖给别人穿。偷工减料的开发商说，我建的这些房子有问题，我不住，卖给别人住。我修的那些桥也很危险，我不过那些桥，让别人走。医生说，过度输液降低免疫力，损害肝肾，大量使用抗生素有风险，很多高价药品的疗效一般，很多身体检查其实根本不需要。

梦想多难兴邦的中国，在经过了文革那种放弃人格，丧失人性，不惜置他人于死地的“政治互害模式”之后，又开始升级进入到了“经济互害模式”里面。

五十年里，在这种只顾自己暂时利益，不管他人是死是活的互害模式之下生存，即使人们的物质和肉体侥幸保持完好，也都注定了精神与人格的缺失。

历史上，皇权时代的中国也是人治社会，每隔一段时期就要改朝换代一次，每临改朝换代也都注定有一场残杀。皇权时代的中国历史之中，有压迫，有屠杀，也有反抗，也有因果报应。

历史上的中国，单纯依靠互相杀来杀去，当然不可能找到公平公正的生存方式，但是也没有冲破人性道德的最后底线，那时的政权还是打算传给皇家子孙后代的，权力与财富的占有者们，也以能够在中国这块土地上长期世袭为荣，那时还没有像今天如此这般，把财产和家属转移出这块土地。

皇权时代对人性的破坏，还是控制在一定道德底线范围之内的，所以太平天国才能被剿灭，义和团也没能发展成 ISIS。

今天，回顾这肉体与灵魂从疯狂到麻木的五十年，从1966年到2016年，从文革的诬陷揭发，批斗杀害，丧失人性道德底线开始，到后来的举国拜金，唯利是图，丢失诚信。从食品有毒，奶粉有毒，到每一口呼吸的空气都被污染，从集体围观跳楼自杀，到冷漠对待6000万留守儿童和大量弱势群体，等等必然全民互害之中。

——试问如今谁人不在其中？

——试问将来谁人能够幸免？

——五十年后，回顾过去那场残害了几代人的文革，其实也是在祭奠今天残缺与迷失的自己。

——任何一种病症，灾祸和危险，只要根源还在，危害就会继续存在，还会不断升级成各种灾难模式，还会继续带来更多的互相伤害，一直到人治社会最后的崩溃。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胡海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华夏文摘》网址： http://www.cnd.org/ ，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 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 cnd-cm@cnd.org		
